

近十年来国内媒介化传播研究:特点、问题与趋势

张小雪¹, 于晓峰², 李雨桐²

(1. 清华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 北京 100084; 2. 深圳大学 传播学院, 广东 深圳 518060)

摘要:为了解和掌握当下国内媒介化研究成果的全貌,分析当前国内媒介化传播研究的特点及问题,借助 CiteSpace 对中国知网 (CNKI) 数据库中新闻传播领域具有较大影响力的 8 本期刊进行文献计量统计,精选出 201 篇文献(2010—2020 年),通过机构合作网络、作者合作网络和关键词共现分析等,探讨目前国内媒介化传播研究的关键问题、媒介化研究未来的方向和路径选择。研究认为,近十年来媒介化研究的特点是以质性研究、个案研究为主,侧重于对媒介化、中介化概念的辨析和对技术、时空的思考;目前媒介化研究存在的问题是研究方法相对单一,关于西方理论溯源上的争议性和本土化的缺失,跨学科、跨领域和跨地域之间的学者合作关系尚未形成等;未来媒介化传播研究的发展趋势主要聚焦于某一社会现象,关注媒介化社会下媒介与身体的联系,同时在借鉴西方理论和实践的基础上,落脚本土化,推动基于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媒介化研究。

关键词:新闻传播;媒介化;中介化;知识图谱分析;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新媒体技术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6248(2021)06-0071-11

Research on China's media-oriented communication in the past ten years: characteristics, problems and trends

ZHANG Xiaoxue¹, YU Xiaofeng², LI Yutong²

(1.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 China;

2. School of Communication, Shenzhen University, Shenzhen 518060, Guangdong, China)

Abstract: In order to understand and master the overall picture of China's current media-oriented research results and analyze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problems of China's current media-oriented communication research, this paper uses CiteSpace to measure the literature of 8 journals with great influence in the field of news communication in the DATABASE of China National Knowledge Network (CNKI), and selects 201 articles (from 2010 to 2020). Through institutional cooperation network,

收稿日期:2021-04-05

作者简介:张小雪(1995-),女,山西太原人,文学博士研究生。

author cooperation network and keyword co-occurrence analysis,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key issues as well as future direction and path selection of media-oriented communication research in China.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in the past ten year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media-oriented research are mainly qualitative research and case study, focusing on the discrimination of media-oriented and intermediation concepts, as well as reflections on technology and time and space. At present, the problems in media-oriented research are as follows: repetitive research methods, the controversy over the origin of western theories and the lack of localization, and the immature cooperation between scholars across disciplines, fields and regions.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media-oriented communication research in the future is to focus on a certain social phenomenon, pay attention to the connections between media and body in the media-oriented society, and at the same time implement localization and practice media-oriented research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under the Marxist view of news on the basis of systematically learning from western theories and practices.

Key words: news communication; media-oriented; intermediation; knowledge mapping analysis; Marxist view of news; new media technology

在媒介渗透的社会背景下,媒介化成为最能够体现媒介重要性的概念之一,也是媒介研究的新路径^[1]。21世纪以降,以北欧和德国为代表的欧洲媒介研究学者开始陆续从“媒介研究”转向“媒介化研究”^[2]。传播是社会信息的传递,在新闻传播学领域一直以来都是依托媒介去实现传播的效果,传播是依托介质发挥作用的。人们传播信息的方式可以分为线上和线下。一般而言,线下的传播活动依托于人与人之间的面对面交流,而在面对面的交流过程中,人们发出的信息通过空气这一介质传达于受众。在线上传播活动中,人们通过不同的电子媒介进行传播。也就是说,在电子媒介时代以前,信息通过空气这一介质进行传播,而在电子媒介产生之后,人们依靠电子媒介进行传播。在媒介技术的不断发展之下,人与媒介的关系也在潜移默化中发生了改变,人们开始关注到“媒介化”这一中间过程。过去的媒介作为一种“高科技”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之中,人们使用它为自己获取更多的便利,且有充分的自主选择权。当下媒介成为了人们生活的一部分,人们依托媒介进行各种日常活动,例如交流、购物和支付……这也就使得社会逐渐成为了一个“媒介化社会”。媒介化社会是媒介与社会之间互动关系模式的一种表述,受众对于信息的依赖

与需求是媒介化社会形成的前提,媒介技术的演化则为其提供了可能性^[3]。不同于媒介研究,对于媒介化的研究在学术界是具有一定的争议的,所以很多学者试图通过对媒介化进行定义,从而能够更好地理解媒介化研究。

一、文献综述

在对文献进行爬梳剔抉的过程中,笔者发现国内有关媒介化研究的文献在理论溯源层面上是较为缺乏的。仍有一些学者就此进行过讨论,例如周翔等^[1]在探讨网络社会中的媒介化问题时,从动态的情境中理解作为元过程的媒介化,将媒介化学说的代表人物费雷德里希·克罗兹(F. KROTZ)、温弗里德·舒尔茨(WINFRIED SCHULZ)、安德烈亚斯·赫普(ANDREAS HEPP)等对于媒介化的研究细数一番,拨开了媒介化研究理论的迷雾。其中,舒尔茨将媒介化通过进一步的具体化和过程化将其分为了延伸(extension)、替代(substitution)、融合(amalgamation)和接纳(accommodation)。但是面对庞杂的社会乱象,这些文献在广度和深度上而言,其解释力度是远远不够的。

还有一部分学者对媒介化理论的研究着眼于

更为宏观的社会文化环境,也有一部分学者将细腻的媒介化研究笔触伸向了中观和微观的层面。侯东阳等^[4]分别从微观、中观和宏观层面对媒介化研究的内容进行了总结:从微观层面而言,强调的是通过将媒介与人们日常生活联系起来从而使媒介研究具体化,例如针对人们的媒介化程度,日常媒介的使用和依赖情况等进行研究;从中观层面而言,侧重于分析各个领域制度或体制是如何卷入媒介化的;从宏观层面而言,主要侧重于分析媒介化对文化和社会更大或者更为一般性的影响,例如媒介对文化的建构过程、媒介与价值观念、生态整体和社会变革之间的关系等。

学者们也逐渐关注到媒介研究中的媒介化,并进一步衍生出对媒介化社会的探讨。在有关媒介化社会的表达中,张帆^[5]认为在媒介化社会中,媒介不仅仅表现为一种传播的手段和载体,更是成为了一种社会管理的方式,并指出新媒体为不同利益主体提供话语表达空间。“国内外新闻与传播前沿问题跟踪研究”课题组等^[6]认为社交媒体的兴起为公共事务议题的讨论带来了新的空间。姜红等^[7]认为在媒介化的背景下,媒介与政治的互动是更为频繁的,并且以“讲故事”作为文章的主要落脚点,将“讲故事”作为一种媒介逻辑与政治实践结合起来,而新时代新闻舆论工作中的“讲故事”能够在盘根错节的网络化社会中,推动政治传播的社会抵达。

值得注意的是,一直以来由于不同国家的语言差异,在文献的输入和输出过程中对于媒介化和中介化的翻译引起了学术误会。媒介化(mediatization)与中介化(mediation)的用词经常出现混用的现象,侯东阳等^[4]认为,虽然中介化和媒介化有着不同的词源和意义,但是在媒介化研究方面,它们都可以泛指媒介化,都是研究媒介、媒介变革与社会、文化变迁之间的关系。然而周翔等^[1]基于文献的爬梳与反思,着重辨析了媒介化与中介化的差异,并且将媒介化作为一种元过程试图阐释其中的媒介逻辑,同时进一步从网络社会日常生活实践的角度理解和分析媒介化的社会空间表征以及网络化逻辑延伸等问题;同时认为,从本质上而言,媒介

化是一个宏大层面的概念,是媒介效果向宏观社会效应的一种延展,在这种延展的过程中,人们可以理解媒介变革带给社会的种种错综复杂的社会后果。也就是说,媒介化强调的是在社会进程中,不同领域和层次上的媒介与技术在其中所强化的作用。媒介化将“媒介研究”放置于更为宽阔的社会层面,并且也关注到微观层面上对日常生活实践的媒介渗透。

本文主要是对中国知网 CNKI 中与新闻传播研究有关的具有影响力的期刊文献进行研究,通过将高频关键词、研究机构、作者和突现词等进行可视化分析,更好地对近十年来有关媒介化研究的热点、特点、问题以及趋势进行综合梳理,旨在为促进国内媒介化研究的理论丰硕和实践拓展提供参考。

二、数据收集与分析

(一)研究方法

科学知识图谱是以知识域为对象,揭示科学知识的发展进程与结构关系的一种图像。它具有“图”和“谱”的双重性质与特征:既是可视化的知识图形,又是序列化的知识谱系,显示了知识单元或知识群之间网络、结构、互动、交叉、演化或衍生等诸多隐含的复杂关系,而这些复杂的知识关系正孕育着新的知识产生^[8]。CiteSpace 是一款基于共引分析理论和寻径网络算法等开发的可视化知识分析软件,能够直观展现领域或学科的信息全景、宏观结构以及一定时期发展的趋势与动向,并且可以探测与发现领域研究的热点及前沿^[9]。

陈超美在 Java 的网络语言环境中开发出了这一款 CiteSpace 的文献分析软件^[10]。通过对数据来源进行转化预处理,并且在 data 处导入清洗处理过的数据,利用软件中的作者合作、机构合作、关键词共现等功能图谱,对了解有关媒介化的研究,有着“一图谱春秋,一览无余;一图胜万言,一目了然”^[8]的效果。

在研究中,笔者借助 CiteSpace 5.6. R3 软件中

的机构合作网络分析、作者合作网络分析、关键词共现分析和关键词突现分析等功能,通过对新闻传播学领域中复合影响因子较高的学刊中所发表的与“媒介化”有关的论文进行分析,窥探当下有关媒介化研究的热点和前沿,更好地为与媒介化有关的研究做铺垫和导引。

(二)数据来源

本文以中国知网(CNKI)数据库作为原始数据源,通过2020年的复合影响因子和综合影响因子进行排序,将国内8本在新闻传播学领域中具有较高影响力的新闻传播学类核心期刊(CSSCI收录,复合影响因子 ≥ 1 ,见表1)作为数据分析样本,这8本期刊分别为《国际新闻界》《新闻记者》《新闻与传播研究》《新闻大学》《现代传播》《当代传播》《新闻与写作》和《新闻界》(根据复合影响因子的高低进行排序)。在这次“媒介化研究”的过程中,笔者以有关媒介化的文献作为数据来源,而非聚焦于媒介研究。从宏观层面而言,任何媒介研究都会或多或少涉及媒介化过程,而这次研究主要关注媒介化的过程,所以在进行相关文献搜索时,以“媒介化”作为关键词和摘要分别进行检索和数据的处理。为防止得到重复的样本量,笔者在中国知网上进行检索时,以关键词和摘要得到的数据进行对比筛选,并在数据内容导入到CiteSpace时,运用该软件的数据处理功能去重,最后得到的数据样本共204篇。

表1 国内8种新闻传播学类的核心期刊
(复合影响因子 ≥ 1)

期刊名称	主办单位	复合影响因子	综合影响因子
国际新闻界	中国人民大学	2.988	1.675
新闻记者	上海报业集团、上海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	2.755	1.482
新闻与传播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	2.743	1.639
新闻大学	复旦大学	2.181	1.098
现代传播	中国传媒大学	1.694	0.807
当代传播	新疆日报社、新疆新闻工作者协会	1.381	0.659
新闻与写作	北京日报报业集团	1.254	0.524
新闻界	四川日报报业集团	1.131	0.493

(三)检索方式

本次研究以2010年1月1日到2020年10月1日作为时间范围的限定,以“媒介化”分别作为关键词和摘要,同时在这一过程中反复对比分别以“关键词”和“摘要”作为搜索内容而显示的文献,以免有重复文献的出现和漏检误检的情况。通过表2显示,《现代传播》《当代传播》和《新闻界》这3本期刊中有关媒介化研究的发文量是较多的,分别为57篇、34篇和34篇,而有关媒介化研究比重较大的是《新闻与传播研究》《当代传播》和《现代传播》,分别为1.44%、1.28%和1.07%。

三、基于CiteSpace的媒介化研究知识图谱分析

笔者通过对8本期刊的检索数据进行清理和整合,将收集到的有关媒介化研究的相关文献在CNKI上以refworks的格式进行文本形式的文献导出,然后将其命名为“download_01”放置于命名为input的文件夹中,利用CiteSpace进行数据的转换与分析。在软件参数值设置的区域将时间切片的跨度设置为2010—2020年,并且选择每一年作为一个时间切片。在text processing区域中选择默认选项(标题、摘要和关键词等),依据不同的目的选择不同的节

表2 国内8种新闻传播学类的核心期刊中媒介化研究的论文数量与比重统计(2010—2020)

期刊名称	论文数量/篇(B)	与媒介化研究相关的论文数量/篇(A)	百分比/%(A/B)
国际新闻界	2 320	23	0.99
新闻记者	2 658	15	0.56
新闻与传播研究	1 324	19	1.44
新闻大学	2 744	16	0.58
现代传播	5 349	57	1.07
当代传播	2 658	34	1.28
新闻与写作	4 991	4	0.08
新闻界	3 233	34	1.05
总计	25 277	201	0.80

注:截至2020年9月25日的中国知网数据统计。

点类型,例如作者、机构、主题和关键词等,在剪裁方式区域中根据裁剪效果适当对不同的剪裁方式进行选择和调整,最后得到相应的知识图谱。

(一) 时空知识图谱分析

1. 时间分布图谱

通过统计不同年份的文献发表量,可以更好地了解某一年份时间段内研究发展趋势。笔者统计了2010—2020年国内8种新闻传播学类核心期刊中有关媒介化研究的文献发表量,通过图1显示,在国内8种新闻传播学类的核心期刊中,虽然文献数量规模整体低于35篇,但是从整体上而言,有关媒介化研究在国内8种新闻传播学类的核心期刊中呈现上升趋势,2010—2015年在国内8种新闻传播学类的核心期刊中有关媒介化研究的论文呈现一定的波动,波动范围在5篇左右。而在2018年达到了有关媒介化研究的最高值(31篇)。在2018年的文献中,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对媒介化进行了研究,例如王琛元^[11]、侯东阳等^[12]和常江等^[13]对媒介化概念化与研究路径的思考;李彬等^[14]和杨光影等^[15]对媒介化与空间的思考;曹晋等^[16-17]对于媒介化和社会生活联系思考。在这些文献中,学者们也关注到基于不同的国家话语对于媒介化的研究:袁光锋^[18]探讨了媒介化的他国“苦难”所促发的“全球同情”有可能会超越民族国家的边界;王琛元^[11]认为自20世纪90年代以降,“媒介化”逐渐成为欧洲传播研究的关键词,通过对欧洲传播研究的“媒介化”研究进行批判性的回顾,以此来廓清相关概念与理论,从“中介化”到“媒介化”,再到媒介的定义和制度视角以及社会建构视角来深入探讨欧洲传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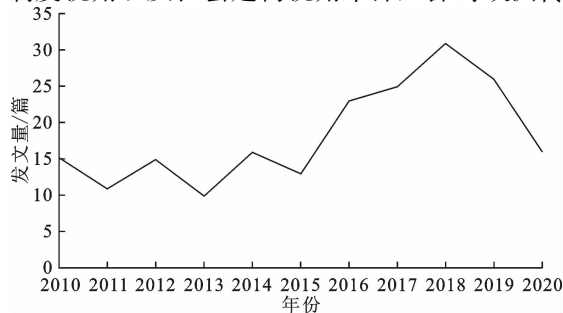


图1 国内8种新闻传播学类的核心期刊中媒介化研究的文献年度发表趋势(2010—2020)

范式的不同。

2. 空间分布图谱

(1)机构合作网络分析。CiteSpace 能够将研究机构与作者的发文量、与其他机构的合作关系以及机构间的紧密关联,通过圈轮大小和连线的形式呈现出来。圈轮越大,表示此机构在有关某一研究领域的发文量越多;节点之间的连线越粗,表示两个机构之间的合作越为紧密^[19]。同时,图中不同文字的大小代表该机构在数据源中出现的频次多少。

在2010—2020年间,国内8种新闻传播学类的核心期刊内有关媒介化研究的机构中,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是国内媒介化研究文献产出的主要机构;其次是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再次是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最后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云南大学人文学院新闻系、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上海大学影视艺术技术学院等对媒介化研究的相关文献产出量大致相当。同时在这次研究调查中,不同学校之间对于这一研究领域存在学校与学校之间的合作,例如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和云南大学人文学院新闻系之间的合作研究。也有部分学者没有利用地缘合作优势进行合作研究,例如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和上海大学影视艺术技术学院之间有关媒介化的研究并无合作联系。

(2)作者合作网络分析。通过归纳和总结对某一研究领域中某些学者的发文情况,可以更好地了解在这一领域中学者的研究方向、路径和目前的困境。表3是2010—2020年国内8种新闻传播学类的核心期刊中有关媒介化研究的7位活跃的作者名单。经过统计分析,这些作者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2012—2020年,其有关媒介化的研究发文量均在3篇及以上。如学者李春雷对于媒介化的研究是从2013年开始,从2013—2018年都在做相关研究。学者胡翼青对于媒介化的研究主要集中于2017年(2篇)和2020年(3篇),学者孙信茹在2012年集中做了有关媒介化的研究,同时在2013年和2019年也有与媒介化相关的研究成果。除了表3显示的

表3 国内8种新闻传播学类的核心期刊中媒介化研究的高产作者(2010—2020)

排名	作者姓名	作者所属学院	发文量
1	李春雷	广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7
2	胡翼青	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5
3	孙信茹	云南大学新闻学院	4
4	杨星星	云南大学新闻学院	3
5	张涛甫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	3
6	张昆	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	3
7	关琮严	湖州师范学院文学院	3

作者以外,还有很多学者对媒介化研究这一领域有较高的贡献,在统计中发现平均发文量超过两篇的作者人数高达25位左右。

不同学者之间的合作关系还可以通过作者知识图谱来窥探。研究结果显示,李春雷和胡翼青对于媒介化研究的发文量是较多的,其次是孙信茹等人,通过作者知识图谱可以呈现较为明晰的学术权力版图。不仅如此,学者李春雷和至少4位学者有过学术上的合作与交流;学者孙信茹和杨星星的合作关系较为紧密,其余的学者零星分布在各处,说明了在研究数据源中,其他学者在媒介化研究这一领域中未曾与他人合作。

(二) 内容知识图谱分析

1. 关键词共现分析

关键词图谱作为CiteSpace的一种输出型图谱,能够通过对这一图谱的认识了解到某一段时间有关某研究的研究热点。而关键词是共现网络分析中具有代表性的一项,是对文章研究内容的高度凝练和总结,领域内关键词出现次数越多,越能代表领域内的研究热点^[20]。

在本次研究中,笔者通过对数据资料的获取和分析获得2010—2020年新闻传播学类核心期刊对媒介化研究的研究热点。研究结果表明,学者将媒介化、媒介化社会、媒介逻辑等作为媒介化研究的重要关注点。词频分析的结果(数字大小的结果)显示,第一,学者们对于媒介化的分析依托于媒介理论和媒介逻辑,也就是说媒介逻辑和媒介理论在媒介化问题研究中是学者们重点关注的层面。第二,媒介化社会也逐渐成为学者们讨论的热点,结

合数字互联网时代的特征,媒介渗透于人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使得人们越来越关注媒介的重要作用,而媒介也从过去的“附属位”逐渐转化为“正位”,人们开始进入到一个媒介化社会,故而有关媒介化社会的探讨也越来越多。第三,新闻传播教育和新闻传播规律也是学者们在研究媒介化问题时的关注领域。张昆^[21]提到,在媒介化社会中,新闻教育面临着诸多的挑战,希望能够通过科学的战略思维定位和培养,达成发展目标,回应社会的期待。施海泉^[22]提出了新闻传播课程设置应考虑是否能够适应新媒体的发展潮流,以及是否符合新媒体环境下催生的媒介化社会,并提出了与此相关的具体措施方案,例如夯实基本技能的教学与训练、强化培养专业主义信念的课程以及增加新媒体理论与操作实务。周廷勇^[23]提出人们已经进入到媒介化生存状态后,通过分析媒介和教育的本质特征,对教育进行了思考和探索。

2. 关键词突现分析

突现词是指在短时间内出现频率骤增的关键词,CiteSpace软件具有探测突现词的功能,可以直观地展示研究前沿之间的演进路径和交互关系^[24]。如图2所示,在经过关键词分析之后得出了以下5个突变关键词(按照强度大小依次排序):“媒介化社会”(2.08)、“突发公共事件”(1.67)、“媒介逻辑”(1.5)、“新闻传播规律”(1.31)和“大众传媒”(1.08)。其中值得注意的是,从2011年伊始,学者们便围绕“媒介化社会”对“新闻传播规律”和“媒介逻辑”进行研究,尤其是在2019—2020年,学者们开始将“媒介逻辑”应用到“媒介化”的研究之中。

关键词	年份	强度	起始时间	结束时间	2010~2020
突发公共事件	2010	1.67	2010	2020	
大众传媒	2010	1.08	2010	2020	
新闻传播规律	2010	1.31	2011	2020	
媒介化社会	2010	2.08	2012	2020	
媒介逻辑	2010	1.50	2019	2020	

图2 国内8种新闻传播学类的核心期刊中媒介化研究的关键词突现图谱 Top 5

3. 研究主题路径分析

CiteSpace能够形成关键词时区图(主题路径演化图),让人们能够更为直观地了解到不同时间阶

段(2010—2020年)有关媒介化研究的动态过程和发展规律,具体操作为在CiteSpace中的Layout的功能区选择“Timezone View”,得到2010—2020年媒介化研究的时区图谱。

研究结果显示:从2010年中国媒介化研究开始,在2010—2013年,研究热点多集中于“媒介化”“媒介化社会”“媒介逻辑”“媒介政治”“媒介”等方面。2014—2018年,在时区图谱中呈现研究热点逐渐减少的趋势,而研究领域也从政治更多地转为关于民主和公共性的讨论。而2019—2020年,通过时区图谱显示,学者们较多关注“媒介理论”“媒介化研究”“健康传播”“新闻专业主义”“公共危机事件”等方面。媒介化研究作为一种长期的、缓慢的研究效果,2010—2020年都有不同的学者基于前人的研究基础开展思考,故而近两年来学界浮现出越来越多关于媒介化研究和理论思考的文献,成为了最新热点。

四、国内媒介化研究的特点、问题与趋势

(一)国内媒介化研究的特点

1. 国内媒介化研究立足于国外媒介化研究的理论

中国学者往往从“网络社会”“数字化生存”等角度出发,将媒介化视为对当代社会的表征,并无特定的理论内涵^[11]。而目前国内对于媒介化研究的理论概念有赖于传播学者安德烈亚斯·赫普、施蒂格·夏瓦、克罗兹、舒尔兹和尼克·库尔德利等学者对媒介化命名和阐释的学术贡献。赫普认为媒介化试图把握媒介、传播的变化与文化、社会的变化之间的关系,能够反映一定的互动和相互依存关系,同时可以被用来描述与媒介、传播有关的长期的变革关系^[13]。克罗兹则认为媒介化这一概念描绘了在长期的社会发展中,媒介逐渐地与日常生活、社会和文化作为一个整体的建构而紧密相关^[25]。同时在有关媒介化理论溯源的论文中,一些

学者们对媒介化的研究溯源主要依托西方的理论,例如戴宇辰^[2]认为,“媒介化社会”脱胎于卡斯特所定义的“信息化社会”并且经由齐美尔的“形式社会学”和“媒介逻辑”的观念改造之后引入传播学的研究之中,从而形成了两种研究传统的“媒介化研究”。再如学者胡翼青等^[26]提出通过布尔迪厄的场域视角也许能够为媒介化理论打开另外一种路径的可能性。

2. 质性分析是国内媒介化研究的主要研究方法

在本次研究调查中,201篇关于媒介化的研究文献基本采用质性分析以及对二手资料的阅读分析,在大部分的文献中都主要是以理论的梳理与探讨、现象的批判作为主要出发点,尤其是在媒介化研究的范式界定,以及概念、路径与启示部分的讨论中。还有一部分文献以网络民族志的方法为主去讨论基于技术的介入和影响对日常生活的影响。例如曹晋等^[16]基于媒介化的日常生活研究主要探讨了网络民族志的研究方法,并强调参与观察是互联网民族志的核心方法,同时在这一过程中要注重与研究对象的互动和对话。孙信茹等^[27]对白族微信对歌行为和实践进行了田野调查,探讨了在技术介入之后对人们构成的新的日常生活以及在这种日常生活之中生成的新的社会交往方式。

3. 国内媒介化研究的侧重点

通过图谱分析和作者的补充阅读,笔者认为国内学者有关媒介化研究呈现出不同的侧重点,经过整理和分析将目前国内8种新闻传播学类的核心期刊中媒介化研究的主要侧重点归纳为以下4点:

(1)国内媒介化研究的核心概念。媒介化和中介化。目前国内对于媒介化研究的概念与理论有着诸多思考,而媒介化与中介化的讨论被很多学者重视。事实上有关中介化和媒介化的区别是十分复杂且存在争议的。潘忠党^[28]通过对传播学文献中有关“媒介化”和“中介化”理论内涵的辨析,强调中介化是人们如何运用中介的手段和机制开展他们的生活。郭恩强^[29]从社会学的角度,通过古典社会学家西美尔、现代社会学家吉登斯之后的后现代社会学家波斯特等人的理论主张,为阐释“中介化”

和“媒介化”二者之间千丝万缕的关系提供了新的路径。王琛元^[11]将西方对于媒介化和中介化的讨论进行了梳理,同时基于不同地域如北欧、拉美和英国地理位置上的差异导致文化的差异,从而引出关于中介化的讨论,得出媒介化和中介化二者是互补但并非对立,所有的媒介化现象都是基于中介化的现象之上。另外,亚当斯等^[30]将移动性置入了中介化/媒介化,认为中介化/媒介化移动性是指被一系列技术和相关的实践所增强和改变的运动,是处于支配地位的媒介化元过程,甚至可以被视为移动性与中介化的复杂缠绕。

(2)媒介化研究与技术之间的关系。目前国内研究对媒介化与技术的关系进行了深刻的批判。有一部分学者在媒介化的着眼点上对技术的发展持有积极乐观的态度,也有一部分学者在媒介化的背景之下对这一观点持有相反的观点。例如彭增军^[31]以诙谐幽默的文风探讨了在媒介化背景下出现的各色新闻,例如慢新闻、正面新闻、建设新闻等,同时阐明了计算新闻的出现对于新闻业界和学界的冲击。再如单波等^[32]对于技术的批判,认为媒介的控制表现为理性的控制,而且把这种控制媒介化,形成无所不在的意识操纵。也就是说一旦将媒介的控制形成长期的媒介化,就会渗透到人们方方面面的日常实践活动之中,形成一种无所不在的意识操纵。而李龙等^[33]对媒介化社会中社交媒体对恐怖主义的某种赋能也产生了深刻忧虑。

(3)由媒介化衍生的媒介化社会实践个案研究。通过将媒介化研究与人们的日常生活实践、互联网的语境进行结合,以媒介化进行个案研究。何志武等^[34]以“快速移动、频繁互动”的媒介化社会作为背景,以武汉H小区拟建临终关怀医院这一冲突作为研究个案,认为社交媒体已经成为了集体抗争行动的重要“新媒介武器”。丁未等^[35]以西部双峰村农民工求职经历作为个案,采用口述史和民族志的研究方法研究媒介化社会中新媒介技术(手机)对农民工的赋权,同时强调了这一赋权作用下对农民工这一群体的重要作用。孙信茹等^[36]基于媒介化社会的背景,通过个案研究的方法调查和分

析媒介与乡村社会生活互动的基本规律。

(4)媒介化研究与时空问题进行有机结合。在新闻传播研究领域,学者们以前对于空间和地方概念有所忽视。正如孙玮所言:“即使在20世纪60年代社会科学领域掀起了巨大的空间理论思潮,但在这很长的实践里竟然并未在传播与媒介领域得到响亮的回应。”^[37]而现在,学者们对于媒介化的研究在时空方面的考虑有了新的进展。李彬等^[14]认为媒介与空间在社会关系框架内是具有一致性的,即空间具有媒介性质,媒介也具有空间的性质。基于此反观媒介进化和空间发展的历史轨迹,以电子媒介时代作为分水岭确定了空间媒介化和媒介空间化的两种趋势。而空间媒介化就是在电子媒介时代之后媒介发展的主导趋势,是通过虚拟空间以自身为媒介进行意义再生产和社会关系的再建构。秦朝森^[38]以小镇青年群体作为研究对象,分析了短视频与小镇青年群体在日常生活的媒介化实践中所存在的物理、网络和心理的三重空间。

(二)国内媒介化研究存在的问题

1. 理论溯源上的争议性和本土化的缺失

在新闻传播学领域中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重视媒介化研究,“媒介化”这3个字也频频出现在学者的论文之中。但关于媒介化的定义、路径研究和理论的理解却并非能够让人一目了然,尽管“媒介化”正在成为传播研究的重要概念,但是这一研究领域在概念、缘起、问题、范畴、路径和方法等方面都是极其具有争议的^[39-41]。另外,翟学伟^[42]对本土化的思考,尤其是基于中西文化不同的背景之下,如何更好地做好本土化研究提出的思考,同样值得学者们进行深刻思考。总之,关于如何理清媒介化研究理论、如何立足于本土化进行媒介化理论的思考以及如何基于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建立起中国特色新闻传播学科体系中的媒介化理论仍然有很长的路要走。

2. 跨学科、跨领域和跨地域之间的合作尚未形成

在对文献进行整理过程中,笔者发现目前对于

媒介化研究的论文中有超过一半是以单独发文为主(约占发文总量的57.7%),而以合作关系共同发文的学者主要是基于某种现实的联系,例如同一学校的同事联系或者师生间的相互合作。事实上在科研探讨过程中,不同空间地域的学者之间的交流和思想碰撞能够促进某一研究领域的迅速发展,尤其是跨学科、跨领域和跨地域之间的学术合作,这些合作能够对媒介化研究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在媒介化研究尚且具有一定争议的背景下,不同空间地域的学者若能够进行学术上的合作,形成百家争鸣的学术气候是有益于这一领域研究的创新与发展的。例如,通过以媒介化为主题的学术会议将处于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学者汇聚起来,共同探讨媒介化的相关问题,推动媒介化研究。同时,新闻传播学作为一门具有交叉属性的学科,在媒介化研究中,学者同样要积极与诸如社会学、心理学、医学等其他领域进行联系,发展媒介化研究的不同方面。

3. 媒介化研究方法较为单一

研究方法是为目的服务的,具备一定的问题意识能够让学者更好地开展研究,而对某一现象提出问题或者假设时,通过合理合适的研究方法验证尤为重要,基于某一领域的问题通过不同研究方法的交叉使用,可以丰富某一领域的研究成果,从而窥见更深层次的社会意义和价值。但是如果采用单一的研究方法对于某一热点进行研究,对整个领域的发展以及学术成果的推进是有局限性的。笔者在对文献梳理和整合的过程中发现,很大一部分学者对于媒介化的研究是基于质化的研究方法,例如胡翼青、曹晋、孙信茹、吴予敏、丁未、刘展和何志武等;而使用问卷调查进行量化研究的学者少之又少,即使有学者通过问卷调查的方法做媒介化的研究,也仅限于描述性统计分析这一层面,例如秦娜等^[39]通过问卷调查的方法获取了121个有效样本,通过媒介使用习惯、媒介认知、媒介信息处理和媒介参与4个纬度对湖北省恩施州某个土家族聚居村落的18~55岁的女性进行了简单的数据统计和描述性分析。

(三)国内媒介化研究的发展趋势

1. 媒介化研究愈加关注与身体的联系

伴随智能时代的到来,各种新兴的媒介技术蓬勃发展例如VR、AR、MR、可穿戴设备等,人们正在迈入一个高度沉浸化的时代。学者也时刻紧跟时代发展的潮流,关注新科技与人和身体之间的密切联系,新技术使得媒介由人的“外化”形式逐渐转为“内化”,同时正在朝向成为人的关键组成部分发展,这也就使得人们愈加重视传播中媒介与身体的关系。尤其是在新技术的发展下,人的身体和媒介产生紧密联系,例如可穿戴设备,技术的革新也将为媒介化研究带来新的发展方向。曹钺等^[40]在“技术与身体”的哲学思考下认为“身体在场”是理解当下人与媒介关系的关键,身体应当被指认为现象学意义上的“知觉身体”,而技术应该是先于人存在的“座驾”,从而形成特定的空间场域。喻国明等^[41]聚焦于移动媒介实践的技术具身与传播研究,将媒介物作为主要的研究对象,探讨了人与媒介物的具身关系。在媒介化的研究过程中,媒介与社会生活的相互联系是尤为重要的关注点。

2. 在媒介化研究中聚焦某一具体社会现象

聚焦某一社会现象是学者们发现问题的关键之处,通过对社会现象中种种问题的思考,不仅能够使得学者从困顿之局中豁然开朗,还能够让学者从具体到一般的过程中凝练理论。翟学伟^[42]以媒介化的范式探讨了网络直播在传播逻辑中的社会实践特性以及关键要素,分析了网络直播在社会互动中被赋予的商业和社会媒介化的新秩序和新规则,并认为在网络直播的媒介化影响下,人与人传播的空间距离和表达门槛的消弭使得个体的行动边界得到扩展,促进了社会的多样性与流动性。秦朝森^[38]基于小镇青年对短视频喜爱的现象探究了小镇青年在观看短视频过程中的三重空间。

3. 基于本土化的研究路径

对于媒介化研究而言,尽管当下中国学者常常借助国外的理论研究来对中国的某一现象进行思考,但随着中国各个学科体系的完善以及不同学科

领域,如社会学、心理学和新闻传播学体系的不断建设与发展,为了充分反映中国社会的媒介化现象,在系统了解西方理论方法之后,立足中国国情、本土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观的理论进一步完善,是未来各个学科发展的方向,也是媒介化研究学者们不断探索的方向。童兵^[43]探讨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与媒介化社会之间的联系,同时主张为了推进媒介化社会建设,媒介必须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指导下时刻清楚自己的定位——政策主张的传播者、时代风云的记录者、社会进步的推动者和公平正义的守望者。所以,基于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指导,结合当下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进行本土化的媒介理论创新,成为了发展媒介化理论的重要途径。

五、结语

媒介和社会在当下早已不再泾渭分明,现代社会也被无处不在的媒介所浸透,而且正是由于媒介对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渗透,学者对媒介化的研究愈加重重视。但是国内有关媒介化的研究尚处于摸索阶段,通过对近十年来国内媒介化传播的研究成果以及知识图谱的分析可知,国内媒介化研究的主要特点是以质性研究为主,立足于国外媒介化研究的理论,同时侧重于对媒介化和中介化的区别研究、侧重于对技术和时空的探讨以及个案研究。目前国内关于媒介化研究同样存在一些问题,例如研究方法上的单一性,关于西方理论溯源上的争议性,本土化的缺失,跨学科、跨领域和跨地域之间的学者合作关系尚未形成等。关于这一领域研究的发展趋势主要是学者们聚焦于某一社会现象,关注媒介化社会下媒介与身体的联系,同时在借鉴和学习西方传播学理论和实践的基础之上,落脚本土化,推动基于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媒介化研究。

参考文献:

[1] 周翔,李稼.网络社会中的“媒介化”问题:理论、实践与展望[J].国际新闻界,2017,39(4):137-154.

[2] 戴宇辰.走向媒介中心的社会本体论?——对欧洲“媒介化学派”的一个批判性考察[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6,23(5):47-57,127.

[3] 张晓峰.论媒介化社会形成的三重逻辑[J].现代传播,2010(7):15-18.

[4] 侯东阳,高佳.媒介化理论及研究路径、适用性[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8,25(5):27-45,126.

[5] 张帆.“民意中国”的传播挑战与责任——“中国发展中的舆论形态学术研讨会”综述[J].新闻记者,2014(1):84-87.

[6] “国内外新闻与传播前沿问题跟踪研究”课题组,殷乐.数字环境中的媒体与受众:表达、参与和叙事[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4,21(9):117-125.

[7] 姜红,印心悦.“讲故事”:一种政治传播的媒介化实践[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9,41(1):37-41.

[8] 陈悦,陈超美,刘则渊,等.CiteSpace 知识图谱的方法论功能[J].科学学研究,2015,33(2):242-253.

[9] 陈超美.CiteSpace II:科学文献中新趋势与新动态的识别与可视化[J].情报学报,2009,28(3):401-421.

[10] 顾理平,范海潮.网络隐私问题十年研究的学术场域——基于 CiteSpace 的可视化图谱分析[J].国际新闻界,2017,39(7):58-89.

[11] 王琛元.欧洲传播研究的“媒介化”转向:概念、路径与启示[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8,25(5):5-26,126.

[12] 侯东阳,高佳.媒介化理论及研究路径、适用性[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8,25(5):27-45,126.

[13] 常江,何仁亿.安德烈亚斯·赫普:我们生活在“万物媒介化”的时代——媒介化理论的内涵、方法与前景[J].新闻界,2020(6):4-11.

[14] 李彬,关琮严.空间媒介化与媒介空间化——论媒介进化及其研究的空间转向[J].国际新闻界,2012,34(5):38-42.

[15] 杨光影,刘娜.文化生产与审美生成:论网络社会的“流动空间”运作逻辑[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8,40(4):103-108.

[16] 曹晋,刘亨利.都市中年男人的同性社交与媒介化家庭沟通[J].新闻界,2018(2):63-72.

[17] 曹晋,孔宇,徐璐.互联网民族志:媒介化的日常生活研究[J].新闻大学,2018(2):18-27,149.

[18] 袁光锋.“国家”的位置:“远处的苦难”、“国家”与中

- 国网民的“同情”话语[J]. 国际新闻界,2018,40(7): 16-36.
- [19] 彭聪. 国内智能传播研究:特点、问题与趋势——基于2013—2019 年新闻传播学类核心期刊文献的知识图谱分析[J]. 现代广告,2020(15):30-39.
- [20] OUYANG W, WANG Y D, LIN C Y, et al. Heavy metal loss from agricultural watershed to aquatic system: a scientometrics review[J]. Science of the total environment, 2018, 637/638: 208-220.
- [21] 张昆. 新闻学院院长的战略思维[J]. 新闻与写作, 2018(12): 68-73.
- [22] 施海泉. 新媒体背景下新闻教学课程设置的基本逻辑[J]. 当代传播, 2011(6): 89-90.
- [23] 周廷勇. 人的媒介化生存与教育的澄明[J]. 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 2018, 40(11): 164-168.
- [24] 周夏宇. 传播学视域下的博物馆研究——基于CiteSpace 的数据挖掘与对比分析[J]. 新闻与传播评论, 2021, 74(3): 68-80.
- [25] KROTZ F, HEPP A. A concretization of mediatization: how "mediatization works" and why mediatized worlds are a helpful concept for empirical mediatization research[J]. European journal for the philosophy of communication, 2011, 3(2): 137-152.
- [26] 胡翼青, 郭静. 自律与他律:理解媒介化社会的第三条路径[J]. 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19, 48(6): 128-135.
- [27] 孙信茹, 王东林. 微信对歌中的互动、交往与意义生成——对石龙村微信山歌群的田野考察[J]. 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 2019, 41(10): 19-25.
- [28] 潘忠党. 玩转我的 iphone, 搞掂我的世界! ——探讨新传媒技术应用中的“中介化”和“驯化”[J]. 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4, 35(4): 153-162.
- [29] 郭恩强. 在“中介化”与“媒介化”之间:社会思想史视阈下的交往方式变革[J]. 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 2018, 40(8): 67-72.
- [30] 保罗·C·亚当斯, 安德烈·杨森, 李森, 等. 传播地理学:跨越学科的桥梁[J]. 新闻记者, 2019(9): 83-96.
- [31] 彭增军. 老谋何以深算? 计算新闻的是与非[J]. 新闻记者, 2019(11): 30-34.
- [32] 单波, 王冰. 媒介即控制及其理论想象[J]. 新闻与传播研究, 2010, 17(2): 41-49, 109.
- [33] 李龙, 支庭荣. “算法反恐”:恐怖主义媒介化与人工智能应对[J]. 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 2018, 40(9): 13-18.
- [34] 何志武, 吴丹. 从“他助”到“自助”:“心理不悦类”“邻避”冲突事件中的媒介选择、自我动员与集体抗争[J]. 新闻大学, 2017(4): 81-89, 149-150.
- [35] 丁未, 宋晨. 在路上:手机与农民工自主性的获得——以西部双峰村农民工求职经历为个案[J]. 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 2010(9): 95-100.
- [36] 孙信茹, 杨星星. “媒介化社会”中的传播与乡村社会变迁[J]. 国际新闻界, 2013, 35(7): 87-93.
- [37] 孙玮. 中国传播学评论(第四辑)[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9.
- [38] 秦朝森. 脱域与嵌入:三重空间中的小镇青年与短视频互动论[J]. 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 2019, 41(8): 105-110.
- [39] 秦娜, 李烨辉. 社会性别视角下少数民族地区女性媒介信息处理能力调查——以恩施州 W 村为例[J]. 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 2015, 37(12): 162-164.
- [40] 曹钺, 骆正林, 王颀濛. “身体在场”:沉浸传播时代的技术与感官之思[J]. 新闻界, 2018(7): 18-24.
- [41] 喻国明, 杨嘉仪. 理解直播:按照传播逻辑的社会重构——试析媒介化视角下直播的价值与影响[J]. 新闻记者, 2020(8): 12-19.
- [42] 翟学伟. 人情、面子与权力的再生产[M]. 2 版.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
- [43] 童兵.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与媒介化社会[J]. 当代传播, 2016(6): 4-5, 14.

(责任编辑:王佳)